

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演变 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红霞 王 悦

【摘要】本文基于1978~2017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演变不仅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作用，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经济制度主要通过纠正资源错配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应继续推进经济制度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以弥补“结构红利”的消解；各地区应视区情实施不同产业经济政策，东部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中西部应加快形成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双引擎，东北地区则要尽快找准契合地区经济实际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关键词】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20）—02—0031（07）

【作者】张红霞，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淄博 255049

王 悦，硕士研究生，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淄博 255049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现之一，是资源投入端的合理性与集约性，以及产出端的产品高质性与高效性。近年来，中国强力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但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还较多，尽管中国R&D、科技贡献率、社会专利申请量等增长都较快，但社会原始创新动力不强，在核心技术和重要基础性零部件等方面的瓶颈突破缓慢，致使经济运行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较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和多次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层面和产业结构层面的调整都比较快，这就决定了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短期性和多变性。^[1]已有文献表明，“供给侧”三个层面中的制度层面变革和产业层面结构性优化，正逐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2]，但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演变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复杂性，也因中国各地区的区情而异。因而，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还需结合特定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来开展。基于此，本文拟对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演变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四大区域的差异性进行研究 and 探讨。

一、理论机制分析

1. 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由于其对人的行为约束和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3]，反映经济制度演进的重要指标包括政府职能转换、金融市场发展、国际化水平等。^[4]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制度的确立降低了社会体制成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生产分割环境下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化模式研究”（4177117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山东省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18BJJ01）。

本,中国经济出现了相对高速增长。但在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新的体制约束出现并引致体制成本再度回升,社会产出成本负担加重,再度阻碍中国经济增长。^[5]但另一视角,新经济制度的出现重新确立了经济增长质量的规范,把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限制在一定负外部效应范围内。如,新经济制度会抑制可能发生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机会主义倾向,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保障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6]事实上,合理的制度安排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减小或抵消遵循制度规范的成本损耗,产生良性的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2. 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产业结构演变会促进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会加速新兴产业兴起,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结构性加速”。^[7]同时,产业结构演变通常意味着新旧行业的更新替代,主要表现为尚处幼稚期的新兴产业与处于快速衰退期的传统产业同期重叠,产出增长速度迟缓进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8]产业结构演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两种效应,使得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贡献,这种贡献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而呈现边际递减,^[9]当经济体的“结构红利”逐渐消退时,盲目追求产业结构升级意义不大,而应更加重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10]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由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为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减速”的主因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调整。^[11]

3. 经济制度变迁及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缺乏制度支撑的产业结构往往难以有效和有序地促进经济增长。^[12]合理的制度设计会降低体制成本,制度变迁引致更低的交易费用、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规范的交易行为等,会推动劳动力、资本与技术产业间合理流动,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13]显然,良好的制度环境会激发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要素合理配置,并提高技术创新率和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与扩散率,有利于产业结构快速优化。^[14]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制定实施和不断完善的财政制度、产权制度、金融制度、对外开放制度等,^[15]都是以健全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市场行为规范为目标,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推动经济增长。

如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经济制度、产业结构等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已开展诸多研究,但关于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基于制度约束下的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还很少见,即使在少有的有关三者综合研究的文献中,生产无效率这一常见现象且影响产业结构演变判断的因素也被忽略,使得研究过程与经济现实较难吻合。

二、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郑若谷等(2010)的做法,以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为基础,将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随机前沿分析框架,视生产要素产出弹性、技术水平为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函数,^[16]将表达式刻画如下:

$$\ln Y_{it} = \eta_0 + \sum_{m=1}^n \tau_m z_m + \sum_{j=1}^n \rho_j x_j + \sum_{j,m=1}^n \pi_j z_m x_j + (\alpha_0 + \sum_{m=1}^n \gamma_m z_m + \sum_{j=1}^n \varphi_j x_j + \sum_{j,m=1}^n \mu_j z_m x_j) \ln K_{it} + (\beta_0 + \sum_{m=1}^n \omega_m z_m + \sum_{j=1}^n \theta_j x_j + \sum_{j,m=1}^n \lambda_j z_m x_j) \ln L_{it} + v_{it} - u_{it} \quad (1)$$

由式(1)可知,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演变,都直接或间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

直接效应。 τ_m 、 ρ_j 和 π_j 分别表示在资本(K)和劳动(L)投入不变时,剔除对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后,经济制度(z_m)和产业结构(x_j)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z_m x_j$)对经济规模的直接影响。

间接效应。 γ_m 、 φ_j 、 μ_j 和 ω_m 、 θ_j 、 λ_j 分别表示经济制度(z_m)、产业结构(x_j)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z_m x_j$)对资本(K)和劳动(L)的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是经济制度、产业结构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影响要素资源配置的具体体现,即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根据以上推导,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演变都可视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生产过程还存在诸多非效率现象。^[17]基于此,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演变两变量并考虑生产无效率的检验模型,以使探讨的问题更贴近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三、数据说明与指标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相关指标的选取和计算具体如下:

1.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

采用惯例做法，以 Malmquist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 (DEA) 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指数，作为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 Y 的代理指标。TFP 测算涉及的产出变量，以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的实际 GDP 指代 (以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涉及的投入变量以各省份资本存量 K 和劳动投入 L 指代，其中资本存量以各省份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 (以 1978 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10% 为初始资本存量，折旧率设定为 9.6%)，劳动投入以各省份就业人数表示。

2. 经济制度变迁指标

(1) 财政政策。以财政分权指代财政政策，^[18]具体以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2) 金融政策。考虑数据可获性，选取金融机构存贷款占 GDP 比率来指代金融政策，具体以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3) 对外开放政策。以对外贸易规模指代对外贸易政策，^[19]具体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4) 国内投资政策。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指代国内投资政策，具体以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上述指标测算中，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和趋势外推法予以补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并节约回归处理的自由度个数，本文借鉴郑若谷等 (2010) 的做法，将以上 4 个制度变量以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为一个综合经济制度变量 S，以指代各省份的制度水平。^[20]

3. 产业结构演变指标

依据不同经济体发展进程中的部门经验，产业结构演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合理化；二是高级化。本文采用泰尔指数 T 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行测度，用公式表示为：

$$T = \sum_{i=1}^n \left(\frac{Y_i}{Y} \right) \ln \left(\frac{Y_i / Y}{L_i / L} \right) \tag{2}$$

式 (2) 中，T 代表结构偏离度，Y 代表产业产值，L 代表产业就业水平，i 代表具体产业，n 代表产业数量。T 值越偏离零时，表明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越高。

对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 U 进行测度，用公式表示为：

$$U = \frac{V_s}{V_m} \tag{3}$$

式 (3) 中，U 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V_m 代表第二产业产值，V_s 代表第三产业产值。如果 U 值不断增大，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方向发展，即产业结构处于升级进程。

进一步地，笔者将 T 和 U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其转变为正向指数，结果如式 (4)、式 (5)：

$$T_{it} = \frac{\max T_{it} - T_{it}}{\max T_{it} - \min T_{it}} \tag{4}$$

$$U_{it} = \frac{U_{it} - \min U_{it}}{\max U_{it} - \min U_{it}} \tag{5}$$

表 1 全样本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1 lnTFP	模型 2 lnTFP	模型 3 lnTFP
S	-0.0539***(-5.15)		-0.0322***(-2.63)
T		0.1266*** (3.30)	0.1202*** (3.13)
U		0.0538 (1.43)	0.0459* (2.17)
lnK	-0.0113***(-5.47)	-0.0276***(-10.64)	-0.0195***(-6.29)
lnL	-0.1027***(-3.33)	0.0231*** (3.60)	-0.0990***(-2.77)
T* lnK		0.0035 (0.90)	0.0066* (1.71)
T* lnL		-0.0194***(-3.16)	-0.0208***(-3.38)
U* lnK		0.0202*** (5.21)	0.0154*** (3.60)
U* lnL		-0.0265***(-4.10)	-0.0199***(-2.92)
S* lnK	0.0057*** (4.18)		0.0068*** (3.10)
S* lnL	0.6537*** (3.29)		0.7397*** (3.33)
constant	-0.3959***(-2.15)	0.0951 (1.60)	-0.1138 (-0.95)
obs	1240	1240	1240
总体方差 σ ²	0.0021***	0.0021***	0.0020***
变差率 γ	0.8019***	0.7120***	0.7345***
无效率均值 μ	0.5935***	0.5483**	0.5538***
时变参数 η	-0.0514***	-0.0507***	-0.0553***
对数似然函数值	2163.157	2174.8982	2188.3047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 内为 z 统计量。

四、回归检验与结果分析

基于时变衰减模型，本文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MLE)，对 1978 ~ 2017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全样本、交互作用、分时段和分区域的四项检验。

1. 全样本回归检验

首先，分别就单一经济制度变量和单一产业结构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回归检验。然后，就两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作用的影响进行回归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1。

由模型 1 和模型 3 的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和显著的正向间接影响，这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新实施的系列新经济制度，引

致产生一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全社会因制度创新所获取的收益还未抵补新制度引致的额外溢出成本，但这些经济制度有效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劳动产出效率，并有效传导至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由模型 2 和模型 3 的回归结果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直接正向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合理化的作用更显著。产业结构演变的间接影响有所不同，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劳动产出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对资本产出效率具有较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资本产出效率提高，但会抑制劳动产出效率。

综合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演变抑制了劳动产出效率的提升。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第二、三产业结构的演进未遵循比较效率的原则，^[21] 劳动力由第二产业部门向低效率第三产业部门的转移，会造成资源错配，并造成诸如“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和“鲍莫尔成本病”等问题的出现。

2. 交互作用的回归检验

通过加入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演变的交互项，可以就经济制度约束下的产业结构演变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做进一步的考察，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交互作用的回归检验结果

直接效应		资本产出效应		劳动产出效应	
变量	lnTFP	变量	lnTFP	变量	lnTFP
S	-0.0482 [*] (-1.77)	lnK	-0.0163 ^{***} (-3.94)	lnL	-0.0557 (-1.53)
T	0.1724 ^{***} (4.14)	T* lnK	0.0057 (0.85)	T* lnL	-0.0293 ^{***} (-3.06)
U	-0.0027 (-0.06)	U* lnK	0.0120 (1.55)	U* lnL	-0.0011 (-0.83)
T* S	0.2195 ^{***} (4.11)	S* lnK	0.0092 ^{**} (2.43)	S* lnL	0.4576 ^{***} (1.98)
U* S	0.2208 ^{***} (3.68)	T* S* lnK	0.0354 ^{***} (6.42)	T* S* lnL	-0.0061 (-0.81)
constant	-0.3192 (-1.49)	U* S* lnK	0.0197 ^{***} (3.41)	U* S* lnL	-0.0082 ^{***} (-2.90)
Obs			1240		
总体方差 σ^2			0.0019 ^{***}		
变差率 γ			0.7934 ^{***}		
无效率均值 μ			0.5512 ^{***}		
时变参数 η			-0.0785 ^{***}		
对数似然函数值			2216.8306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 内为 z 统计量。

观察交互项作用的直接效应可以发现，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系列新经济制度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观察交互作用的间接效应可以发现，经济制度变迁与产业结构演变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说明改革开放后的新经济制度实施在推动大量国内资本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同时，也改善了资本的优化配置与效率提升，进而表现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经济制度变迁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劳动的产出效率，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新经济制度的实施并未有效调控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红利传导至劳动生产率，仍然制约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分时段回归检验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多次转折点，若从市场制度推进角度表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大致可划分为 5 个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显著特点。基于此，笔者对经济制度改革和产业结构演变在不同时段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回归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3。

(1) 1978~1984 年，经济制度改革启动。国家有计划地调节轻重工业比重，产业结构开始趋向合理，此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在此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并不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显著，但由于这一时期第三产业发展开始显露苗头，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资本转移速度，因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资本的产出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时期的制度改革是对过去经济中“虚高”现象的扭转，因而制度改革对资本产出效率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2) 1985~1992 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全面展开阶段。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此时期对于继续计划经济还是实现行市场经济还没有定论，产业结构调整 and 制度改革都处于探索时期。

(3) 1993~2000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这一重大的制度变迁使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外贸外资规模迅速增加，不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还是制度变迁，都有效提高了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并间接促进了经济规模

的扩张。不过,这一时期的制度改革开始对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其主要原因是此时期体制成本重新上升,使得企业成本负担加重。

表3 分时段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1978 - 1984lnTFP	1985 - 1992lnTFP	1993 - 2000lnTFP	2001 - 2007lnTFP	2008 - 2017lnTFP
S	0.1395 (1.50)	0.0799 (1.07)	-0.2116***(-4.92)	-0.1634**(-2.51)	-0.0442 (-1.15)
T	0.2678**(2.26)	0.1266 (0.96)	0.0790 (1.24)	-0.1580 (-1.62)	0.0828 (0.79)
U	-0.0095 (-0.05)	0.0222 (0.18)	0.0300 (0.34)	-0.1208 (-1.34)	0.0954 (1.06)
lnK	-0.0143 (-0.81)	-0.0023 (-0.12)	-0.0704***(-6.97)	-0.0532***(-4.57)	-0.0185 (-1.49)
lnL	0.0199 (0.39)	-0.0388 (-0.68)	0.0370 (0.74)	0.0869 (1.44)	0.0073 (0.09)
T* lnK	-0.0410 (-1.32)	-0.0099 (-0.44)	0.0287**(2.31)	0.0559***(-4.61)	0.0632***(-4.62)
T* lnL	0.0008 (0.03)	-0.0110 (-0.54)	-0.0354***(-3.39)	-0.0319***(-2.22)	-0.0861***(-5.29)
U* lnK	0.1229**(2.42)	0.0204 (0.80)	0.0843***(-5.45)	0.0495***(-3.30)	-0.0029 (-0.23)
U* lnL	-0.0842**(-2.19)	-0.0133 (-0.42)	-0.0878***(-6.02)	-0.0305*(-1.88)	-0.0074 (-0.47)
S* lnK	-0.0285*(-1.68)	-0.0087 (-0.72)	0.0308***(-4.49)	0.0194**(-2.34)	0.0031 (0.66)
S* lnL	0.0049 (0.01)	0.4113 (1.07)	0.1864 (0.58)	-0.5224 (-1.36)	0.1584 (0.29)
constant	-0.0636 (-0.24)	-0.4811 (-1.17)	-0.1057 (-0.38)	0.8149**(-2.42)	-0.1425 (-0.28)
obs	217	248	248	217	310
总体方差 σ^2	0.0033***	0.0020***	0.0122***	0.0006***	0.0013***
变差率 γ	0.7231***	0.9348***	0.9474***	0.5727***	0.5240***
无效率均值 μ	-0.2337***	-9.3745***	-0.2379***	0.0524**	0.2421*
时变参数 η	0.3354***	0.0983***	-0.0436***	-0.2549***	-0.0003***
对数似然函数值	357.2427	426.52036	563.26043	529.08146	645.86981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内为z统计量。

(4) 2001~2007年,中国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选择空间增大,大量外来资本进入高生产效率部门,带动了资本的优化配置和资本产出效率的提升。但由于此阶段外资大量投向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演变并未有效提高劳动产出效率。

(5) 2008~2017年,中国在经受金融危机后进入战略重新调整时期。此时期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但2008年中国政府面向市场的4万亿投资,刺激了由于需求不足而闲置的生产力,第二产业的规模扩张迅速刺激了短期经济增长。因此,此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提高了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并间接促进了经济规模的扩张。

4. 分地区检验

进一步地,本文将中国大陆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板块^①,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进行判断,分区域回归检验结果见表4。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发展,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特别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影响很显著。东部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正向资本产出效应。经济制度变迁对东部的资本产出效率和劳动产出效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劳动产出效应非常显著。这一检验结果反映出东部在保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推进的同时,应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中部地区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存在显著关系,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积极作用,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提高中部劳动产出效率,推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更有利于提高劳动产出效率。经济制度变迁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都不显著,相比东部而言,中部地区制度实施效果不明显。这一检验结果,反映中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是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

西部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抑制了西部地区的资本产出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显著提高了西部地区的资本产出效率,也显著抑制了西部地区的劳动产出效率。这一检验结果反映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都较低,应特别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均衡发展。

东北地区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较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经济制度变迁具有较显著的正向资本产出效应。而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未产生明显影响,仅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劳动产出效应,进而抑制了经济的高质量

^① 其中,东部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及海南10个省份,中部区域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及湖南6省,西部区域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12个省份,东北区域包括辽宁、吉林及黑龙江3省。

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应归究于东北地区历史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体制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偏重以资源开发和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重化工业产业结构，也制约了创新发展，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表 4 分区域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 lnTFP	中部 lnTFP	西部 lnTFP	东北 lnTFP
S	-0.0330 ^{**} (-2.14)	0.0089 (0.23)	-0.0357 (-1.48)	-0.0219 [*] (-2.21)
T	0.1425 [*] (1.95)	0.5231 ^{***} (2.69)	0.1016 [*] (1.89)	0.0877 (0.72)
U	0.2939 ^{***} (3.54)	-0.1774 (-0.76)	-0.0464 (-0.82)	-0.4658 (-0.71)
lnK	-0.0235 ^{***} (-4.61)	-0.0383 ^{***} (-4.63)	-0.0096 ^{**} (-2.05)	-0.0231 (-1.59)
lnL	-0.0178 ^{**} (-0.23)	0.0439 (0.18)	-0.0537 (-0.82)	-0.2413 (-0.31)
T* lnK	0.0248 ^{***} (3.86)	0.0160 (1.52)	-0.0234 ^{***} (-3.25)	0.0003 (0.02)
T* lnL	-0.0419 ^{***} (-3.84)	0.0808 ^{***} (2.75)	0.0087 (0.89)	-0.2480 ^{***} (-3.60)
U* lnK	-0.0099 (-1.46)	0.0165 (1.64)	0.0277 ^{**} (3.54)	0.0009 (0.03)
U* lnL	-0.0218 (-1.60)	0.0062 (0.20)	-0.0207 [*] (-1.90)	0.0748 [*] (1.69)
S* lnK	0.0031 ^{***} (2.54)	-0.0010 (-0.21)	0.0019 (0.59)	0.0038 ^{**} (2.29)
S* lnL	0.1966 ^{***} (3.36)	-0.0366 (-0.02)	0.3545 (0.89)	3.0968 (0.56)
constant	-0.0717 (-0.14)	0.0257 (0.01)	-0.1986 (-0.59)	-4.2627 (-0.80)
obs	400	240	480	120
总体方差 σ^2	0.0013 ^{***}	0.0012 ^{**}	0.0019 ^{***}	0.0011 ^{***}
变差率 γ	0.7435 ^{***}	0.7853 ^{***}	0.7945 ^{***}	0.78631 ^{**}
无效率均值 μ	0.2018 ^{***}	-0.0430	0.5739 [*]	0.0923 ^{**}
时变参数 η	-0.0089 ^{***}	0.0154 ^{**}	-0.0072	-0.0005 ^{***}
对数似然函数值	751.59075	465.976	830.20787	236.3763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内为z统计量。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结论如下：(1) 产业结构演变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2) 产业结构演变还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作用，影响其产出效率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影响。(3) 经济制度本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经济制度主要通过纠正资源错配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4)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变迁和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性特征，这一影响作用的复杂性与中国的改革进程紧密相关。

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 继续推进经济制度改革。完善的经济制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继续大力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减少对要素市场的制度性或行政性约束，才能释放“制度红利”以弥补“结构红利”的消解，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 根据不同地区受制度与产业结构影响的程度差异实施不同的重点发展举措。东部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提高劳动要素流向第三产业释放的结构红利；中西部应加快形成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双引擎，培育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结构，避免落入“低端锁定”的境地；东北地区则要尽快找准契合地区经济实际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提高资本产出效率。

参考文献：

- [1]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11, (05): 4-16, 31.
- [2] 武建新, 胡建辉.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 (03): 7-17.
- [3] North, D. C.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 (03): 359-368.
- [4] 樊纲, 王晓鲁, 张立文, 等.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J]. 经济研究, 2003, (03): 10-18.
- [5] 周其仁. 体制成本与中国经济 [J]. 经济学 (季刊), 2017, (03): 859-876.
- [6] 钞小静, 任保平.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TFP贡献的考察 [J]. 当代经济科学, 2008, (04): 23-29, 124-125.

- [7] [美] 钱纳里等著, 李新华等译. 发展的模式: 1950~1970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112-120.
- [8] 韩永辉, 黄亮雄, 邹建华. 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时代的来临 [J]. 统计研究, 2016, (05): 23-33.
- [9] 刘伟, 张辉.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J]. 经济研究, 2008, (11): 4-15.
- [10] [16] [20] 郑若谷, 干春晖, 余典范.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制度效应——基于一个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 (02): 58-67.
- [11] 于斌斌. 产业结构调整与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 (12): 83-98.
- [12] Kuz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13-227.
- [13] [美] 道格拉斯·C. 诺斯, 张五常, [美] 李·J. 阿尔斯通等, 罗仲伟译.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415-431.
- [14] 齐兰, 徐云松. 制度环境、区域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西部面板数据的动态关系研究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 (12): 22-33.
- [15] 黄纯, 龙海波. 政府辅助性制度工作、制度逻辑与集群升级——基于余姚和安吉两地集群演化的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6, (06): 148-166.
- [17] 涂正革, 肖耿. 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5, (03): 4-15.
- [18] Zhang, X.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6, 34 (04): 713-726.
- [19] 高越. 国际生产分割模式下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11-115.
- [21] Herrick B, Kindleberger C P. Economic Development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83. 15-16.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High-Quality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ZHANG Hong-xia WANG Yue

(School of Economics ,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Zibo 255049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1978 to 201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not onl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but also exerts an indirect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acting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func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 economic system indirectly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by correcting resource mismatches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o this e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release the "institutional dividends" to make up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ructural dividends". Each region should implement different industrial economic policies depending on the local conditions. The eastern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high-en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hould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twin engine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Northeast should find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hat fits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陈明